

# 十年來大陸匪情之演變

朱文琳

十年來的中國大陸，曾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這種變化，只限於匪偽內部的鬥爭，大陸社會仍然是「一窮二白」；人民生活依舊艱苦萬狀。

匪偽內部的大分裂、大變化，固由共產主義制度使然，「三面紅旗」政策的失敗，才是它的直接造因。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匪辭去偽「國家主席」職。其原因，是「三面紅旗」政策遭受重大阻力，黨內發生了路線鬥爭，毛匪以退為進，仍堅持其手訂之左傾冒進政策。但「三面紅旗政策」，使原甚薄弱之經濟，備受摧殘。農民情緒低落，農業因而減產；工業原料缺乏，生產陷於混亂，致供應失調，飢荒嚴重。最重要者，這種出於「頭腦發熱」的「左傾冒險」政策，給匪偽帶來浮誇的政風，更加深黨內的分歧和人民的怨恨。於是匪偽內部，一些良知尚未盡泯的人士，發動對毛匪討伐。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偽國防部長彭德懷，在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的支持下，在廬山會議上散發「意見書」，公開向毛匪聲討。狡猾的毛匪，對這項「突襲」，在驚慌失措之餘，裝瘋賣傻，自我檢討，避重就輕，誘過於人，渡過了這次難關。接着，他於八月召開八屆六中全會，運用他個人在黨的權威，整肅了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此外，毛匪還乘此有利形勢，派遣他的死黨林彪等人，接彭、黃的職位。林彪出掌偽國防部後，召開政工擴大會議，強調突出政治，學習毛澤東著作，走毛澤東建軍路線。此外還大力清除軍中之彭黃潛力，要建立一支又紅又專忠於毛澤東的幹部隊伍。

接「三面紅旗」的失敗，大陸發生連續三年的自然灾害，可以說人禍天災接踵而來，重災區，餓殍遍野，死人累累。一般人民之公糧分配，曾少到三至五兩，多以草根、樹皮、野菜果腹，城市居民與軍隊之口糧亦普遍減少。匪軍官兵和眷屬，因營養不良，患水腫、黃疸病者比比皆是，故匪軍士氣低落，軍紀廢弛，軍民糾紛與持械搶刦事件，如家常便飯。適於此時，匪俄交惡。蘇俄斷然於一九六〇年撤退顧問，斷絕俄援，使匪之工

農生產更形困難。在內外交迫情況下，共匪於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被迫放棄「三面紅旗」政策。於十一月頒佈「農村工作緊急指示十二條」，着重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亦即置農業生產於第一位，同時亦注重輕工業和消費品生產，特別是支援農業之輕工業。那些大而無當的重工業計劃，自然暫緩執行。

一九六一年初，匪黨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會中透露，因經濟危機，導致政治不安，反對匪黨路線者約六百餘萬人，甚至匪偽黨政工作人員中，亦有「壞分子」從事「違法亂紀或破壞」活動。於是決定，經濟方面，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同時貫徹農村公社之退却政策，克服輕工業原料之供應困難，縮小基本建設規模，降低工業發展速度。這年五月實行了「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後，復頒佈了「工礦企業工作條例七十條」，另外，這一系列的新政策，要求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核算制和按勞分配的原則，解散「公共食堂」，發還自留地，鼓勵農民經營副業，同時還實行了「三自一包」的政策；在工業方面，提出重工業下馬的口號，停大煉鋼，工業生產新計劃和配給制，受到嚴格管理；政治方面，強化整肅，并允許農民控訴為民所恨之匪幹，以洩民忿，組織方面，恢復六個中央局，強化中央控制。這一些措施並未收到實效，不僅民間反共日烈，即高級匪幹，亦四出蒐集材料，支持退却政策，展開反毛活動。例如，陳雲於一九六一年在上海吉浦調查人民公社，總書記鄧小平於同年指示楊尚昆着中央辦公廳查閱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中央文件」檢討「三面紅旗」政策。中共中央副總書記兼北京市長彭真，亦下令所屬心腹幹部於一九六一年二月至十二月間進行「農村調查」、「工業調查」、「財貿調查」、「中央文件檢查」等，蒐集反毛材料；彭德懷亦於這一年十一月回鄉調查，搞出五個調查報告。彭某觸景傷神，寫了這樣一首詞：「穀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樣過，請為人民鼓與呼。」述說「三面紅旗」政策帶來的慘狀。此外，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前線」主編鄧拓等人，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到一九六二年九月間，在「北京晚報」

連續發表「燕山夜話」，同年十月，由鄧拓、吳晗（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等人組成之「三家村」專欄，向以毛匪為首的中共，展開隱蔽的，但極凌厲的抨擊。最重要的，也是最著名的，為彭德懷喊冤叫屈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亦於這一年八月「拋出」，影響深遠，對毛匪之打擊很大。

**在** 完成材料和輿論準備後，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之中共反毛首要，於一九六二年一月舉行的「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支持黨內幹部攻擊「三面紅旗」政策，把失敗的責任加諸於毛匪，要求為彭黃平反。可是這項努力被握槍桿子的林彪和偽總理周恩來鎮壓住，沒有作成決議。林彪說「三面紅旗」政策，由於缺乏經驗出現一些問題，這也是難免的，這是必須繳付的學費。在毛匪的領導下，取得了經驗就一定會勝利前進。到了同年二月，中共又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陳雲和彭真在這次會上，針對匪偽財政預算上的赤字，批評「三面紅旗」政策的錯誤，在同年九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匪曾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展開一項努力，希圖廢除或限制為挽救災荒所採取的「退却」政策，同時還要求發動一個新的運動，重整黨的組織，恢復黨的紀律，並給負責幹部以思想教育。

全會雖然同意毛匪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要求，但沒有變更「新經濟政策」的行動。全會決議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從這件事上，既可以看到劉毛間的分歧，同時也可以看出毛匪在黨中的威望的沒落。毛匪說鑒於蘇聯內部發生的事，考慮我國的安全，將政治局常委會區分為第一線與第二線，他退居第二線，劉鄧位於第一線。但是其結果適得其反，更加深了十七年來的「分散主義」，產生了許多獨立王國。十中全會後，乃將第二線取銷。

由於人禍天災，致農村破產，人民生活陷於絕境，（一九六二）年五月，發生空前之難民潮。匪為轉移視線，安定內部，在藏印邊境，製造邊彙，十二月戰爭擴大，匪軍挫折印軍，造成有利形勢後撤退原防，使匪軍之氣焰大增，林彪之聲望增高。

從一九六三年起，大陸經濟逐漸好轉，糧荒亦得以緩和。糧食產量約二千七百億斤，但較一九五七年仍少四分之一強，棉花不足二百萬担，支援農業物資，却年有增加。一九六二年的氮肥產量比一九六〇年增百

分之七〇，一九六三年則比一九六二年增百分之二十。磷肥比一九六二增百分之二十三，化學農藥增百分之十三。農用排灌機械方面，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七年增三・二倍，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比一九六二年同期增長一倍。拖拉機一九六二比一九五七年增三・二倍，一九六三上半年比一九六二年同期增百分之三十。農用電力，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五年間，增長十倍。經濟情況的好轉，使大陸情況較前趨於穩定，但是匪為內部却增加了矛盾和衝突。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始發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即前十條），強調農村中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鬥爭，要求積極展開對地富反壞右份子的鬥爭。同年九月又提出「關於農村社會主義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後十條），把解決農村幹部「四不清」的問題和開展對敵鬥爭相提並論，至於對地富份子問題，採取了慎重的穩健的步子。據稱後十條係鄧小平親自制定。這個新規定頒發後，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親往河北撫寧縣桃園大隊蹲點。後十條和王光美的蹲點調查報告，很顯然和毛匪觀點有原則性的分歧。

## 此

後在文藝工作的領域裏，也產生分歧。一九六二年毛匪的妻子江青開始到文藝界工作。她立刻發覺文藝界不僅不宣揚毛澤東思想，甚且醜化、詆毀毛澤東政策，於是她便向毛匪匯報，採取相應的措施。首先透過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長柯慶施，組織上海的報刊批判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這無疑是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北京市委。隨後，毛匪亦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對文藝問題作了一個重要批示，指摘藝術工作領域中，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言外之意，是在譴責主管部門對資產階級的、反毛的文藝活動熟視無睹。這種文藝領域的矛盾和鬥爭，也反映到軍隊中。同年七月，在林彪的支持下，匪軍在北平舉行了二十天的「全軍文化工作會議」。會中指陳目前從事文藝工作的幹部隊伍中，已被現代修正主義思想、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在工作作風和思想意識上存在嚴重問題。於是訂出今後文藝工作的目標和計劃。除此而外，匪軍還有幾項重大措施，無一不在保衛與強化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領導：一為在軍中——尤其是基層，擴大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強調一切工作和措施都應按照毛澤東思想、黨中央指示、部隊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進行；二以匪黨中央命令，頒佈十九個政治工作條例，條例之精髓在將毛澤

東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思想貫徹其中。此外匪軍「解放軍報」，亦會發表社論，號召繼續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八屆十中全會決議，推進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教育。此時，發現匪軍內部，亦出現重大分歧，總參謀長羅瑞卿，在軍委副主席賀龍支持下，利用林彪多病，不能全神照顧軍中事務的機會，在軍

中攬權抓權，準備奪取林彪對匪軍的領導權。同時他還提倡大比武，和林彪突岀政治的政策相對抗。一九六四年，在偽三屆人代會召開前，賀、羅深信林彪將無法連任國防部長偽職。羅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交位讓賢。一九六四年一月偽三屆人代會結束，林彪在毛匪大力支持下續任原職，羅瑞卿便運用林彪之心腹偽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勸林彪退出政治舞台，安心養病。但林彪不為所動，羅瑞卿則由此種下殺身之禍。此間吾人應注意者，賀龍、羅瑞卿等人篡奪軍權之活動，并非個人行為，而與劉少奇、鄧小平等有關。倘賀、羅的奪權成功，中共歷史，必然改觀。

一 一九六四年的大陸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糧食產量可能接近三千億斤，棉花約一千零八十到二千萬担之間。在此種情況下，匪突於十一月十六日在新疆羅布淖爾進行了第一次原子裝置試爆。隨此種科學突破，匪區教育亦有新的發展。高等學校實行教育改革，執行「少而精」原則，要求學深、學透。要改革教師教學思想，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精選學習內容，減少習題作業，縮小實習項目。此外，還大量舉辦半工半讀學校。在科學教育方面，除增設高等教育部外，還增設國家海洋局和科學技術幹部局，增設研究教學單位，擴大招收研究生。一九六三年一六〇個高等院校招收研究生八〇〇人。一九六四年一八〇個高等院校，招收研究生一二〇〇餘人。在偽中國科學院內，增設地理、自動化、地球物理等十多個研究單位。所有研究生在有關教研室專家指導下，進行培育。此外，還加強研究計劃的管理，器材和圖書資料的供應，設備的及時維修。這一切措施，對匪後的科學發展，產生一定的作用。

原子試爆，助長匪之氣焰，繼續擴大其反俄反美鬥爭。加強與亞非拉新興國家關係。匪創「中間地帶」理論，強調亞非拉是介乎美俄之間的第一個「中間地帶」。此外，還爭取美國以外的西方國家，企圖建立外交關係，強調西歐北美和澳洲等資本主義國家是第二個「中間地帶」。匪企圖利用法國戴高樂的「第三勢力」和西方國家間的矛盾，達到孤立美俄的目的。在匪的對外活

動中，先後與法國、突尼西亞、剛果（布拉薩）、桑比亞、達荷美等國建交，當時承認匪偽者，增至五十個國家。

## 在

此期間，毛匪澤東一面利用反美運動，恢復他在國內外的聲望。一

九六四年，共匪發動的五次反美運動中，他發表談話和聲明四次；另方面，在政治上進行反攻。其重要者：一、一九六四年春，匪黨中央發佈指示，號召單位、個人及各個部門，不分時地積極學習毛澤東著作，務使學習毛著，變成全民的羣衆運動；二、結合思想鬥爭，進行對偽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整肅，對「一分為二」的哲學思想，展開尖銳的批判；三、貫徹階級路線，培養革命接班人；四、要求以階級教育為中心，進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結合「五反」、「四清」、重劃階級、及整風、整黨、整團等鬥爭；五、結合「學習解放軍運動」，提出各黨政領導機關、各工礦企業單位、各羣衆團體、各人民公社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同時還在各個系統建立「黨委政治工作經常辦事機構」。這些辦事機構的負責人，都由轉業或退役軍人充任；六、對「文聯」及其所屬各協會整風問題提出新的具體指示，說這些協會所出版的刊物，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不接近工農兵，不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近幾年竟然跌進了修正主義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將來會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七、周匪恩來在第三屆人大的政治報告中，譴責「三和一少」，批判投降主義。毛匪這一系列攻勢，雖產生一定的效果，但不如毛匪所想者遠甚。

一九六五年是共匪完成經濟調整任務的一年，一九六六年將開始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着重：一開展大寨式農田基本建設；二推廣以「樣版」為中心的農業科學試驗，三加強以副養農的資金積累活動。不過，由於北方各省乾旱持續經年，本年糧棉生產，遭受嚴重影響。在工業方面，增設領導機構，改進工業設計、管理、生產組織，已為其第三個五年計劃，建立了薄弱基礎。

在內部鬥爭方面，則益趨明顯和尖銳。毛匪因不滿現行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另訂「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內中明白指出這次運動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這些當權派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後，甚至有省和中央部門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他們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在特別召集

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匪曾親自講話，但並未獲得有力的支持。事後毛匪說：「那時，才發覺他們不對。但是北京已在彭真完全控制之下，連一根針也插不進去。我無可奈何，黨中央也沒辦法。」於是只好離開北平，到上海發動組織柯慶施手下大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批評彭真。十一月，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軍事領域，羅瑞卿仍運用各種方法，壓迫林彪讓位，而林彪則透過政治系統，強化毛匪和他對軍隊之掌握。其重要措施為強調突出政治，要求活學活用毛著。此外，還組織高級匪酋，撰寫革命戰論回憶錄，推崇毛匪的軍事路線。林匪還親撰「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進一步顥揚與發展毛匪的革命功勳和戰爭思想。這篇文章，亦可視作共匪領導「世界革命」的策略和戰略。共匪在軍事上另一個重要措施，為取銷軍銜制度。這是它揚棄資本主義建軍路線，走毛澤東建軍路線的一個重要步驟。

這一年的五月十四日，共匪又在大陸西部上空，舉行第二次核子試爆。此外還發現匪發展飛彈不遺餘力，在祁連山、雙城子建有飛彈試驗場若干處。這種成就，對匪之外交活動，並無實際裨益。在反美鬥爭中遭受挫折，在反俄鬥爭上亦日趨孤立，最慘者莫過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失敗使其組織國際第三勢力之夢想破滅。

值得注意者是偽國務院有關國防工業組織之整建。於一九五三年成立第四機械工業部後，陸續又成立了第五、六、七等機械工業部，以匪軍高級將領擔任部長或副部長。對匪偽國防工業之發展，關係至大。

**姚文元**放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槍後，中共中央遵照毛匪的指示，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由彭真任組長，負責草擬有關文革的匯報提綱。於此同時，毛匪誘捕偽總參謀長羅瑞卿，並於十二月三十日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對羅進行鬥批。同時，還以「二月政變」的口實，改組偽總參謀部由林彪嫡系將領楊成武代總參謀長，完成對軍令系統和北平守備之控制。

一九六六年二月，由五人小組草擬之「二月提綱」經劉系中央批轉各級黨委，作為文化革命的指導文件，由於它和毛匪思想有基本的抵觸，毛匪非常不滿，但當時并未表示意見，却由林彪於一九六六年三月支持江青，主持

「部隊文藝座談會」，草擬「座談會紀要」，提交中央軍委討論後，公開發表。這個文件，以後竟成了「文革」的指導文件。接着「解放軍報」於四月十二日闡「文藝評論」對電影「兵臨城下」進行批判，十八日又發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大革命」社論，五月八日發表「鄧拓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社論。在人民解放軍的全力支持下，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廣闊地展開。毛澤東集團與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鬥爭，轉趨激烈。

在四月間，毛匪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彭真，接着發出第一批清算彭真等人的文件。五月十六日，又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所謂「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作了嚴厲的批判。六月，毛匪又親自寫信給北大的聶元梓，寫了批該校校長陸平的、也是「文革」的第一張大字報。

七月底，毛澤東由上海回到北平。八月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改組匪黨中央的最高領導，並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中央文革小組」，相當舊中央書記處，領導「文革」之進行。在十一中全會期間，毛匪直接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們，要他們寫大字報砲轟「劉、鄧司令部」，於是「紅衛兵」運動便在各地迅速泛濫起來。而毛匪便利用這些青年的不滿現狀，「破四舊」、「立四新」，揪鬥「當權派」、消滅「牛鬼蛇神」，到大陸各地四出串連，在大陸各地作亂造反，許多幹部人民受到紅衛兵之打擊和滋擾，使匪偽內部和大陸社會亂成一片。這種亂行和暴行，不僅使各級匪幹和善良人民無法理解，而不能忍受，即使偽中央文革小組內部亦分為兩派。以王任重、劉志堅為代表之保守派認為應適當約束紅衛兵的造反活動，避免造成無政府狀態；以陳伯達、江青為代表之極左派，則堅持應「巴黎公社理論武裝紅衛兵，從而砸爛舊國家機器」。兩派相持不下，分歧日甚，終而促成「中央文革小組」和匪軍內部的「全軍文革小組」的改組。內部的一些成員受到整肅。

僅得注意的是，儘管大陸出現如此翻天覆地的驚人變化，這一年的大陸經濟情況，尚未受到影響。據陳匪伯達十月二十四日說，糧食增產二百億斤，棉花增產五百萬担，工業產值，較去年同期增百分之二十六。在這曾一年內，於五月十四及十月二十七日進行過兩次核子試爆。

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造反派」在毛匪的指示下，在大陸各地展開奪權活動。要從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手裏奪回黨、政、文、財大權。由於「懷疑一切」，打擊面過闊，遭受各地乃至匪偽中央的抗拒，並組織保守的「羣衆組織」進行武鬥，與之對抗。奪權受阻，毛派改變戰略，命令解放軍支左，在各地及各個單位實行軍管，並以「三結合」的形式進行奪權。從一九六七年元月至四月，先後完成黑龍江、山東、貴州、上海、山西、北平等六省市之奪權，並建立了「三結合」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匪偽國務院亦被奪權，絕大多數幹部被停職，使之形同癱瘓。由於紅衛兵的過左暴行，在大陸各地打、砸、搶、抄、抓，各立山頭，在大陸各地導發武鬥。

匪軍爲了執行「支左」任務，對某些羣衆組織孰左孰右，真假難明，因而也造成匪軍和紅衛兵間糾纏不清的鬥爭，紅衛兵攻擊軍事首長，衝擊軍隊，搶奪武器，上演了軍隊和紅衛兵間的武鬥。武鬥的各方面均使用武器，從原始的刀矛到大砲、坦克、飛機，戰況之慘烈，死傷之衆多，形同一場戰爭，使奪權鬥爭，一度陷於停頓。終而爆發了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漢事件」。

地方駐軍首長，支持「保守派」革命羣衆組織，鎮壓「革命派」并扣留中央的「欽差大臣」，乃使匪偽內部公然破裂，幾乎發生內戰。毛林通過軍事壓力和政治說服，用談判方式解決了內戰危機。當毛匪在大陸五省巡行之後，發現事態嚴重，「武漢事件」危機四處潛存，遂改變「戰略部署」，爭取軍隊向心，實行「解放幹部」，並鎮壓極左行動。於是中央「文革小組」中的一些成員和由他們組成的「五、一六兵團」遭受整肅。從這一年八月起到年底，又先後完成青海、內蒙古、天津三省市之奪權。

在如此艱鉅、複雜又尖銳的鬥爭過程，不僅匪偽各級黨政機關，均被砸爛，領導幹部頻頻調換，即連爲「全軍文革小組」，亦改組三次。大陸農業及交通亦因武鬥而形同癱瘓。估計糧食產量比一九六六年減產一七〇億多斤（總產量可能達三千億斤）主要經濟作物減產百分之十到二十不等。工業因受領導體系瓦解，工人參加鬥爭，致生產時斷時續，交通運輸受阻，原料和燃料缺乏等影響，降低百分之十五。對外貿易，亦由一九六六年的四十三億美元，降至三十八億美元。

在外交方面，繼續反美、反蘇，并向世界各國輸出紅衛兵，激起亞非國家恐懼和反感，這時匪偽外交部由以姚登山爲代表之極左派掌握，破壞國際

外交原則，鼓動紅衛兵搗毀並焚燒駐北平英國代辦處，並困擾其他國家大使館和外交官，使匪之外交更陷於孤立。年底，所有共匪駐外「大使」，除駐埃及「大使」黃華外，全部調回進行思想改造。

在奪權鬥爭中，匪之科技單位，一度受到滋擾，匪爲積極發展尖端科學，毛林特別下令，在這些單位停止門批改，並予重要科技人員以特別照顧。因此，匪核子武器發展，未受太多影響。於是年六月十七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先後舉行第六、第七次核子試爆。此外，還發現匪軍成立了「第二砲兵」的新兵種。

## 截

止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在中央支左部隊之壓力、周恩來四出奔走協調下，毛林始完成大陸二十九個省市的奪權鬥爭，並分別建立權力機關——革命委員會。在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主任中，有二十名是軍政幹部，九個爲「革命幹部」，沒有一個羣衆代表。二十個省級革委會成立時的一八六名副主任中，革命幹部和革命羣衆代表所佔的比例相當接近。據「紅旗」雜誌說二十九個省市革委會有四千個委員，其中半數是革命羣衆組織的代表。不過到目前爲止，那些擔任省市革委會副主任的革命羣衆代表大部份遭受整肅。至於偽國務院，全部實行軍管，各部會負責人一〇二人中，有四十餘人係軍隊幹部。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當局突然宣佈解除偽中央軍委常委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罪名是五、一六兵團的黑後台，它是毛林集團內部發生新分裂新鬥爭的訊號。一九六八年十月，毛共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決議，將匪黨副主席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同時還通過新黨章等案，印發全黨討論，準備提交「九大」討論通過。

一九六八年的經濟情況，因氣候不佳，肥料不足，社會混亂，農民消極等因素農產又告降低。至於工業生產，與一九六七年相近。

一九六七年十月左右，當毛共奪權鬥爭熾烈進行之際，即着手整黨建黨，要把黨內之叛徒、特務、一切反革命份子、頑固不化走資派階級異己份子、蛻化變質份子，堅決清除黨外。依匪黨之預計，一九六八年夏，最遲不得晚於秋天，召開九全大會，改組匪黨中央。可是由於大陸情況混亂，匪黨內部分歧，黨外干擾太大，不能如期召開，延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始在北平召開九

大，通過新黨章，並選出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與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偽新黨章至為簡約，並充分突出毛澤東個人獨裁的本質。內中特別指出林彪為毛匪之革命接班人。黨員資格，以忠於毛澤東思想為先決條件。選舉辦法，放棄無記名投票，改為民主協商方式。新黨章強調一元化領導，沒有集體領導字樣。

「九大」新選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人，職業軍人七十七人佔百分之四十五·三；幹部五十二人，佔百分之三〇·五九；工人二五人，佔百分之十四·六七；農民十一人，佔百分之六·四九；科學家三人，佔百分之一·七九；紅衛兵領袖無，身份不明者二人，佔百分之一·一。候補委員一〇九人，其中職業軍人五〇人，佔百分之四五·八七；幹部一七人，佔百分之一五·五九；工人一四人，佔百分之一二·八五；農民一三人，佔百分之一·九三；科學家二人，佔百分之一·八四；紅衛兵領袖二人，佔百分之一·八四；身份不明者一人，佔百分之二〇·〇八。在上述二百七十九個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八屆中委或候補中委有五十三人。從上述數字可以看出匪黨九屆中央委員會之特點，職業軍人所佔之比例特大；內中吸收了一定數目的工農份子和下級軍官，這是歷來中共中央委員會所未有者。上屆中委及候補中委絕大部份被清出領導圈外。

至於中央政治局有二十一個委員，其中軍事幹部佔十一人，超過半數。上屆政治局委員未進入新領導圈者有陶鑄、陳雲、鄧小平、劉少奇、李富春、陳毅、賀龍、徐向前、譚震林、李井泉、聶榮臻等十一人。新政治局候補委員四人，內中除李雪峯蟬聯者外餘均新人。上屆候補委員烏蘭夫、薄一波、宋任窮等人悉數被鬥倒。謝富治則晉升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亦共匪之最高權力核心有委員五人，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

一九六九年三月，亦九大之直前，匪俄發生珍寶島事件，戰鬥擴大，延至新疆，四千五百里中國邊境，情勢從此更為緊張，有隨時發生大戰之可能。在中共九全大會中，通過反美帝、反蘇修、反各國反動派的三反路線，為共匪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但是在「九大」中，也重彈「五原則」，聲稱願與社會制度不同國家和平共處。在具體實踐上，匪方採取鬥爭與聯合并行的極有彈性之策略，諸如共匪同意與俄方舉行邊界談判，還同意和美國重開華沙

會談。對亞非國家，亦採取比較溫和的態度，它除繼續支援寮、柬、泰、緬、印、馬、印尼等國共黨，進行叛亂活動外，對其他中立主義國家則重施政治籠絡與經援誘惑的慣技——進行統戰工作，其中以對巴基斯坦、尼泊爾、錫蘭、葉門、幾內亞、剛果（布）、坦尚尼亞等國為最。

經濟方面，自珍寶島事件後，匪區經濟亦強調備戰。在工業方面仍着重「自力更生」，但並不排斥學習外國，同時還應與友好國家間互助合作。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原則，念念不忘階級鬥爭，走羣衆路線，繼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在進行工業建設時，須有敵情觀念，縱深配備，戰略部署，注意合理的工業佈局和適當的經濟發展，爭取工業，就近協作，就地配套，一旦戰爭臨頭，就有許多可靠的大小工業基地，有迴旋餘地。同時還應注意戰時與平時，民用和軍用的結合。這一年九月，匪再舉行地下核爆和氫彈試驗。這是共匪畸形工業發展的成果。在農業方面，共匪吹噓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九年，連續八年豐收。但是事實上，在過去八年中，匪連年都要花費三億美元外匯，去購買糧食。至其農業政策仍推廣「農業學大寨運動」，匪在勞動組織與管理上，採用「三不固定一服從」和「基本投工制」，廢止劉少奇的「三包一獎」和「自由投工」制度。學習大寨「標兵分工，自報公議」的計酬辦法，不再採用憑「勞動定額」逐日記工分的辦法。取銷自留地，不搞個人經營，不搞黑市買賣。到了一九七〇年一月，紅旗雜誌發表「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道路」，亦以打擊劉少奇農業路線，重新確立毛澤東的農業路線。其要點：要求通過鬥批改，進一步鞏固農村陣地；堅持依靠貧下中農，建立優勢，鎮壓改造敵對份子，擊破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包圍；加速農業技術改造，實現農業機械化，並貫徹毛匪的「農業八字憲法」；開展學大寨運動。可是同年八月，匪黨召開九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偽憲法草案中，確允許非農業的個體經濟存在，重申人民公社為三級所有制，隊為基礎的制度；允許人民公社社員經營自留地，實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這顯示，匪偽經濟政策的又一次轉變。這種重蹈劉少奇經濟路線的行動，可能是受到廣大工農對匪共的壓力，迫使它不得不讓步，此外，共匪為強化備戰，也不得不採取通過個人利益，刺激勞動生產積極性的措施。

一九七〇年八月，中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是在內部發生新的分裂，整黨建黨工作受到重重阻撓，使毛共的「文革」無法收尾的狀況

下舉行的。它主要的任務是發動對毛匪的功狗，原中央文革小組長、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山頭的整肅，以排除來自極左的干擾，替完成地方的整黨建黨鋪路，這無疑地是匪黨內部的又一次大分裂和大鬥爭。此外，還宣佈籌備在適當時期後召開四屆人大；強調展開「打三反」（打擊反革命份子、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鋪張浪費）運動；強調鬥批改，要繼續展開大批判，要將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與經濟戰線以及各「上層建築領域」之革命進行到底；重申毛匪反美反修聲明，要將「三反路線」進行到底，在五原則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共匪於同年十二月四日，在湖南省成立了省委員會。截止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九日，大陸二十九省市匪共黨委會全部建立，在各

省市二十九個黨委第一書記中，二十二個是軍人，佔總數百分之七五·八六；幹部七人佔百分之二四·一四；在各省市黨委核心領導班子中的一百五十八個成員中，有軍人九四名，佔百分之五九·五〇；幹部五六名，佔百分之三五·四四；羣衆八人，佔百分之五·〇六。拿這個統計數字，和九屆中央委員會成份比較，顯見軍人比重大大提高；羣衆勢力，大為削減。此外，在新成立的各省市黨委領導班子中，早期參加奪權紅極一時之軍隊或黨政幹部，如潘復生、劉格平、張日清、王效禹、李再含、黎原等人，一一落選，那些由「中央文革」培植起來的青年羣衆骨幹份子，入選者絕少；可是一些受到紅衛兵攻擊，被中央文革點名批判的黨政高級幹部，如趙紫陽（原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賈庭三（北京市副市長）等人，却獲得「解放」，重新擔任領導職務。一些原在國務院部會擔任正副首長的幹部，如劉星、宋致和、鄧存倫、殷君毅等人，忽然在地方出現，擔任黨的領導工作。現在二十九省市黨委會雖告成立，但縣以下黨機構全部建成者，不過湖南、江西、廣西三省而已。

在各省的整黨建黨中，發現對陳伯達山頭的整肅，已全面深入展開。不過，它的發展，仍然通過曲折的過程，那就是說，內部的鬥爭也相當複雜、相當尖銳。當九屆二中全會揭露整肅陳伯達的蓋子後，批陳鬥爭仍甚隱蔽，仍甚徐緩。在湖南諸省黨代表會中，仍未作深刻的批判。直到一九七一年三月，「紅旗」雜誌發表批陳專文，在三月十五日召開的市黨代表大會上，對陳匪展開激烈的鬥爭。後來召開黨代表會的各省市亦復如此。

除此而外，各省市或以「黨委會寫作小組」或「革委會寫作小組」的名義，「組織文章」，展開對批陳鬥爭。當七月一日，「兩報一刊」發表紀念匪黨五十週年紀念專文，批陳鬥爭可以說全面展開。在批陳鬥爭的同時，大陸各地正展開整肅「五·一六兵團」殘餘，整肅極左思潮的鬥爭，這二者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以陳伯達和毛匪個人的公私關係，以陳伯達個人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以陳伯達代表的組織和力量，無疑地批陳鬥爭是匪黨內部又一次的大分裂。這種分裂是從黨中央最高領導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到地方，範圍之大，影響之深，並不稍讓對劉、鄧「當權派」的鬥爭。這一場廣泛而劇烈的內部門鬥爭，使一再拖延，最後決定於今年十月舉行的偽第四屆人代會，可能再度延期。

一九七一年二月三日，周匪恩來對史諾發表談話說：大陸自一九六二年以後，連續九年豐收，目前「工業生產出現新的高潮」，第三個五年計劃已經勝利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已開始實施。周匪還透露了一些重要生產數字，諸如一九七〇年糧食總產量二億四千萬噸（超過四千八百億斤）；工業總產值（包括工業及運輸方面），商業及服務外貿（不計在內）約九百億美金；棉布產量為八十五億公尺；化肥產量為一千四百萬噸；鋼產量為一千萬噸至一千八百萬噸之間；原油產量超過二千萬噸。關於十年來，共匪經濟情況已見前述，大陸人民生活仍很窘困，周匪所說之數字自屬欺人之談，此間似無庸詳加討論。吾人應注意者，周匪撒謊之目的，他除向世界偽示「文革」業已勝利，大陸已經安定之印象外，並以經濟繁榮進步，作為它打破孤立，晉身國際社會之敲門磚。史諾之應邀訪匪，便是共匪向美國勾搭的一項重要步驟。

今年四月，共匪突邀美國乒乓球隊赴匪區訪問，使二十二年來的美匪外交僵局解凍。繼之，七月間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祕密赴平與周恩來會談。對會談內容，雙方迄未宣佈，惟事後雙方宣佈尼克森總統將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訪問北平。在匪美勾結的前後，共匪並未降低其反美叫囂，但美國方面却放寬對匪貿易，宣佈支持共匪入聯合國，並取代我國在安理會之席位。影響所至使世界姑息主義更加張狂，一些國家已在改變對匪外交政策，準備承認共匪，使世界反共陣營為之削弱，此等對匪有利的情況，便是共匪與美國勾搭目的之一。此外，共匪最主要目標，在假藉美國的助力，消除蘇俄和我國政府的軍事和政治壓力。至於爭取與美國進行科學技術的合作

交換和經濟貿易的互通有無，解救其經濟建設困難，幫助發展尖端科學，亦為其希望和目的。目前，匪美勾搭，在匪區導發混亂和分歧，共匪正以學習毛匪的著作「論政策」和「關於重慶談判」，統一思想，團結內部。這兩個文件是在說明，共匪企圖團結次要敵人，打倒主要敵人。同時也是對美國的一種「針鋒相對的鬥爭」。

目前共匪在與美勾搭之同時，還加強對共產國家、亞非拉和西方國家之外交活動，前者在分裂蘇俄陣營，後二者則在廢續其「中間地帶」戰略，構成反世界「超級大國」的統一戰線。

**四** 前匪區的中小學教育，已恢復上課，在正常課業外，加強「學工、學農」及「校外教育」。教育內容，力求精簡，只設有政治、語文、工農基礎知識、軍事、體育和勞動。至於校外活動，則要求學生幫助家庭和街道舉辦「毛澤東思想訓練班」、推動家庭和街道「鬥私批修」、與街道羣衆聯合召開「街道批判會」，此外還有辦校外調查工作者。目前中小學最大困難為缺乏教材，舊的不能用，新的沒編好。在大學方面，大陸五百所院校，祇有七十五所招生，學生由各方面選送工農兵份子入學，程度不一，施教困難，更以駐校毛宣隊和教師、教師和學生間之矛盾，使教學工作更為困難。此外，匪方還創辦所謂「四種新型學校」，培養「無產階級科技隊伍和教師隊伍」。這種學校包括工業、農業、衛生、師範等，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和在職教師中選拔。

在文藝工作方面，仍然是一片沙漠，除了六個樣板戲外，新近試排了「海港」、「平原作戰」、「杜泉山」、「龍江頌」、「沂蒙頌」等「革命現代戲」。

綜合起來說，十年來的匪區是一幅曲折反復，不斷鬥爭的淒慘景象。這種鬥爭，政策的成份少，權力的成份多。目前，毛匪雖藉匪軍的支持打倒劉鄧，完成整黨。但是，軍人的權力空前膨脹，使匪偽黨政權力，變成軍事官僚獨裁。這種制度，不僅與共匪「黨指揮槍」的理論相背，抑且形成對毛匪個人權力的絕大威脅，埋下地方割據的危機，毛匪佞臣陳伯達的被鬥，便是軍人對毛匪權力的挑戰，地方黨組織整建的曲折、困難，偽四屆人大遲遲不能召開，便是地方割據的訊號。況毛匪年老昏庸，疑心日重，殺戮下屬，如同割草，如此暴虐，使部下人人自危，心存叛離，一旦情勢再變，毛匪必將滅亡。

## 半價徵求新基本訂戶

慶祝建國六十年及「問題與研究」發刊十週年紀念  
本所出版各期刊公開徵求國內新基本訂戶一萬戶！

凡即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訂閱本所各期刊之  
國內讀者，一律半價優待。直接函購叢書特價優待。

問題與研究（全年十二期半價實收60元）  
ISSUES & STUDIES（全年十二期半價實收240元）

問題與研究（在日本發行）

東亞季刊（全年四期半價實收80元）

### 叢書特價

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	特價 50元
歷史寫下了答案	特價 40元
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	特價 50元
蘇俄及其附庸	特價 40元
中共的土地鬥爭	特價 30元
中共的文藝整風	特價 40元
德欽丹香的末日	特價 50元
野坂參三與毛共	特價 30元